

从助读系统的演变看当代初中语文教育的走向

周剑清, 杨瑶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语文教材助读系统体现了不同时代语文教育的要求。从历史的不同阶段分析初中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的演变,可以勾勒出语文教育发展的脉络:第一阶段(1949—1963年)助读系统初始期,强调知识的归类;第二阶段(1963—1978年)助读系统完善期,构建语法教学体系;第三阶段(1978—2000年)助读系统成型期,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第四阶段(2000—2011年)助读系统变革期,侧重语文素养的提升;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助读系统融合期,突出语文方法性知识。

关键词:初中语文;助读系统;教育规律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1)05-003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在不断改革的主旋律中前行。助读系统作为教科书的“支架体系”,是“教科书研制者为读者设计、帮助读者理解教科书,以使读者可以方便地使用教科书的手段与工具”^[1]。助读系统包括提示系统、图像系统、练习系统、知识系统、附录系统等,记载了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进程,反映出各时期人们关于语文学科的探索与思考。从历史的不同阶段分析初中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的演变,可以勾勒出语文教育发展的脉络。

1 第一阶段(1949—1963年)助读系统初始期:强调知识的归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都进行了重构。1951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宋云彬等编辑)首次将“国文”和“国语”改为“语文”,从此确立了“语文”这一名称。这一时期的助读系统呈现了叶圣陶等人关于教材助读系统的思考成果,如“将插图纳入语文教材,发挥插图对训练思维和培养审美情趣的作用”,“深入探索注释的内容和编排方式”^[2]。此前,人教社

出版的各套初中语文课本中均无插图,仅在每篇课文后附有注释和“思考·讨论与练习”。其中,注释部分包括解题和生词的注音、解释;“思考·讨论与练习”板块主要包括语法、修辞、文体知识、思想内容等。

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中,语文教育界提出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4年,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颁布,前者规定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拼音字母、标点符号七项内容,后者提出编入教材的内容包括文学作品、文学常识和作家介绍。随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的大纲编写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这个时期出版的教材没有前言和说明,不分单元,仅文学作品和文学常识类课文附有注解和练习,每篇课文平均8道练习题,在几篇课文后配有语文知识小短文,包括词性辨析、句子构造、修辞、书信、启事、会议记录等知识,部分课文内附有插图。1960年的修订版教材,将之前分散在教材中的语文知识短文

收稿日期:2021-04-27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HA190366)

作者简介:周剑清(1970-),男,湖南江永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

单独列在后面的“语法复习提纲”。

这时期的助读系统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从语法、修辞为主的练习题到知识小短文的设置,此阶段的语文教育重视概念性知识,并将其视为打开语文学科之门的钥匙,以语文知识的归类为核心,不同的钥匙匹配不同的知识模块,试图以逐一攻克各个模块的方式,达到语文学习的融会贯通。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有助于形成系统的语文知识,为确定语文学科学习目标和内容体系提供了思路。但是语文各要素的相互独立导致学用分离,语文知识脱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境,从而缺失实际语用功能,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

2 第二阶段(1963—1978年)助读系统完善期:构建语法教学体系

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3],中学阶段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3]。

同年,人民教育社出版《初级中学语文》教材(刘国正、张传宗等编辑)。这是我国第一套较好地体现语文学科基本性质和基本规律的综合型教材。这套教材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为主线,把课文分为精讲和略读两种。这个时期教材的助读系统主要有编者的话(从第三册开始出现),随文注释(如作品简介、作家简介、生词注音解释等),课文语法知识提纲,插图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教材第三册《纪念白求恩》(毛泽东)一课的课后练习共有四项^[4]:

(1)以前讲过四种句子,其中最常用的是陈述句,陈述句表达的意思,有的是肯定的,有的是否定的。在否定的陈述句里,要用“不”“没”“没有”等表示否定的词。(例句略)

(依次介绍肯定的陈述句,否定的陈述句,双重否定句。)

(2)写出这篇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

(3)写一篇短文,说说你对这篇课文的体会以及怎样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4)背诵这篇课文,并默写最后一段。

由上文可知,这个时期的助读系统已经逐步得到完善,每一篇课文后都附带有一定数量的语法知识概念、例句和相关练习。如第一题关于陈述句概念、用法的介绍,这是属于语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丰富学生的语法知识储备,此阶段的语文教育在构建语法教学体系方面有重大突破;第二题要求学生给课文分段、对段落信息归纳,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理解作者的布局谋篇,有利于促进学生说话、作文的条理性和流畅度;第四题则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与积累。这些指令明确、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助读系统为学生搭建起理解和运用语文的有效支架。

但是,这时期的助读系统存在着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册与册、课文与课文之间没有太多关联,仅以语法教学体系为纲无法总领全部的语文要素,这也导致知识的组织缺乏合理的内在逻辑性,如部分习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随意性,学生可以任意发挥,第三题“怎样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便是对此文本的过度拓展;其次,整套教材的呈现存在模式化倾向,不同篇目的课后练习基本流程趋向一致,如皆要求划分层次、概括段落大意或中心思想等。总之,此阶段语文教育对完备的语法体系的追求和标准化的教学模式的实施,其目的都在于促进学生的高效学习。只是最终却掉进了限制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图式的陷阱,让学生的语文学习变成枯燥的纯技术训练,从而失去语文最原始的动人的情感因素。

3 第三阶段(1978—2000年)助读系统成型期: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

改革开放后的这段时期,布鲁纳的发现教学法、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赞可夫的教育与发展学说等理论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成为我国教育秩序重建的重要理论依据。1978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标志着语文教学重新回归正轨。通过对以往教育经验不断总结和反思,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详细列出了关于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听话能力、说话能力的具体要求。如说话训练包括说普通话、说话注意对象和场合、按一定的顺序、用比较恰当的语调表达感情等25条细则。将能

力训练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地位。

这一时期依据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主要有《全日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和《六年制重点中学语文课本》。同年我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义务教育发展阶段。该阶段语文教材最显著的特征是打破了全国“一纲一本”的局面,提倡“一纲多本”,出现了教材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版本教材的研制和出版也使得助读系统迅速发展,走向多样化。

人教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以1992年颁布的大纲为依据,强调不同的教学阶段应有针对性地分别培养学生不同方面的语文能力。这一阶段教材的助读系统包括说明、单元提示、训练重点、预习提示、注释、插图、练习、知识短文、语文实践知识、汉语知识、附录等一系列内容,涵盖了以往教材中所出现的助读系统要素。在人教社1992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一册中,《背影》一课助读系统(提示语)明示了三个方面的重点:中心和段落层次、朴实的饱含深情的语言、关键语句的含义^[5],使教师和学生对所要掌握的语文能力有一个大致了解。这个时期助读系统的特点是能力点比较明确,对课文需要掌握的具体能力都有清晰的界定。不但课文与课文之间能力点分明,而且每一册教材也按语文能力的序列进行排列,如“第一阶段培养一般的语文能力→第二阶段培养记述、说明、议论三种专门的语文能力→第三阶段培养实践运用的综合的语文能力→第四阶段培养阅读欣赏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实际运用能力”^[6]。以往的语文教材中课文后附带的“思考与练习”大多分为“思考”和“练习操作”两个层次,而人教版教读课文后的练习题是分梯次的三个层级,包括“理解·分析”“揣摩·运用”“积累·联想”,从引导学生理解和分析课文的主题思想、文章结构到推敲字、词、句、篇的运用之巧妙,再到通过熟读和背诵积累语言材料,展开丰富联想,拓展思路,加深理解。这种从整体到局部再回到整体的教学步骤为实现学生对课文内容全方位深入的认知提供了确切指导。

对训练重点的明示、对学生学习方向的指导以及层级化的训练为语文教材的科学化提供了有

益的尝试。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将多做题作为语文成绩提高的唯一途径的教学,导致课堂上大量灌输式讲解与机械训练,学生的主动性被大大削弱。同时,这也忽视了创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与课文本身自带的丰厚的文化底蕴。针对这一现状,教育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学习形式的转变弥补语文知识内容的不足。

4 第四阶段(2000—2011年)助读系统变革期:侧重语文素养的提升

2001年,我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力度最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7],同年7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出台,要求“课程目标根据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各个年级相互联系,螺旋上升,最终全面达到总目标”^[8]。据此,人教社出版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这套教材的助读系统包括彩色扉页、“写在前面”、单元导语、课文导读、注释、“研讨与练习”“读一读,写一写”、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附录等内容。

与以往教材中的助读系统相比,新增加的项目有“读一读,写一写”题型和“名著导读”部分。每课的“读一读,写一写”板块包含5~10个词语,反映了教材对学生的写字素养的重视。“名著导读”包括导读、阅读建议、精彩片段、点评、探究思考等内容,推荐名著涵盖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如《朝花夕拾》《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底两万里》《名人传》《格列佛游记》《昆虫记》《傅雷家书》《水浒传》等。多元化的助读系统建设体现了课程理念从重视“双基”训练向综合性、实践性的自主学习的转变。从课内到课外,教材边界的扩大意味着学生不能只满足于课堂上所掌握的知识,这也为语文学科的构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纵观整套教材,首先是助读系统进行了精简与整合。原来单元中的“阅读”“写作与口语交际”“语文实践活动”“汉语知识”几大板块修订为“阅读”和“综合性学习”两个部分。课文后的练

习题数量明显减少,一般在3道题左右,删减以往烦琐的知识和训练项目,更加注重其实用性。从“练习”到“研讨与练习”名称的转变意味着题目答案更为开放,不以追求唯一的标准答案为学习目的,同时强调合作和探究意识,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形成独特的、多样化的结论。另外,练习系统内容也转向体现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唤醒意识,如“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试给狩猎队写一封信,谈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斑羚飞渡》第3题)^[9]习题,旨在积极构建能激发学生情感共鸣的平台,调动学生思考与表达的积极性,这种“基于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感受能力”^[10],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言语经验和言语品质”正是语文素养的实质。

将大量、烦琐的知识进行简化、整合,是提高语文教材的实用性和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必然趋势。开放的练习题设计也让学生有话可说,给予学生表达自己独特想法的空间。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教材练习设计虽利于学生整体阅读课文,但这种依靠多读课文,强调自身感悟文章主旨与文法规律的做法,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失去依托,为课堂教学的无序、教学效率的低下埋下了隐患。”^[11]

5 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助读系统融合期:突出语文方法性知识

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揭开了语文教育改革的新篇章,课程标准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理念,人教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语文实验教科书》就是对这一价值取向的具体实现。2017年,由国家统一审定的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问世,总主编温儒敏指出,统编版语文教材“继承了原来旧人教版教材的比較成熟可行的部分,包括选文和内容设计,又要吸收其他版本养分,超越旧人教版教材”^[12]。

与2011版语文教材相比,统编版语文教材的助读系统无论在编排思路 and 呈现方式上都有了明显的改进,主要体现为大力构建“语文方法性”知识。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科教学意味着课堂教学功能的根本转型——从“知识传递”走向“知识建构”^[13],很显然“知识的建构”又必须以方法为指导,有学者呼吁建立“独立的语文学科体系”必须

以“特殊独立性”的知识结构为支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从学理上建设“语文方法性知识”体系^[14]。统编版语文教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学习方法的明示,如“读一读,写一写”板块的呈现,以往教材只是给出重点词语,对于究竟如何书写没有明确指导。统编版教材的“读一读,写一写”部分则呈现了著名书法家丁勇康先生撰写的硬笔书法示范字,七年级学生练习正楷字,八年级学生练习行楷字。统编版教材关于基础字词部分的精心设计对于学生如何分阶段进行写字训练给出了针对性的有效指导。统编版语文教材将原来的“研讨与练习”改为“思考探究”“积累拓展”两个板块,如《背影》一课中“思考探究”板块主要围绕文本内容设计,引导学生熟悉文本的同时,掌握标题对于文本的特殊意义、细节描写的方法等知识。在其他的助读系统项目中,更是开发了大量的方法性知识,如口语交际板块展示了诸如“讲述、应对、讨论、辩论”等方法,“名著导读”部分介绍了浏览、默读、精读、跳读、做摘要等方法,这类“方法性知识”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学生提高语文综合能力。

语文方法性知识的构建还体现在对教材资源的进一步挖掘。《背影》一课的预习中提到,“作家李广田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15],在补白部分继续补充朱自清父亲读《背影》的资料:“父亲在看到《背影》的几年后,便去世了”^[15],这样前后延续、编排逻辑统一的助读系统设计使得文本不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事物,而是与一代代的国民融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份触动人心的补白资料对于学生进入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情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回忆我的母亲》(朱德)一课后,补充“朱德回忆母亲的形象”(摘自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片段,同一单元的《藤野先生》(鲁迅),课后则附带有“许寿裳谈鲁迅‘弃医从文’”的补白资料。相关文化背景介绍是一个完整的教材逻辑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教材资源从不同侧面描述同一文本,有助于学生树立整体看待事物的价值观,从而形成时代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

6 结语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初中语文教材中助读系

统的编写路径,从插图的首次出现、练习题名称和内容的不断演变,到名著导读的引入、知识短文的回归等等一系列的变化,可以将语文教育历程大致归纳为选择语文学科知识、构建知识体系、侧重训练能力、培养语文素养、落实方法性知识五个教育阶段。目前大量学者和教师正在积极开发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有效的方法性知识,为语文教学搭建可供操作的平台。语文内容和形式的变和不变如何有机融合也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议题。如学习任务群、整合教学与大单元教学的趋势体现了语文内容和形式上的变,而不变的是基本语言规则、语法要素、汉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质等,二者该如何做到统一?在新课改如火如荼地开展中,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语文学科教育的初心,遵循教育规律,完善知识结构,依据具体教材系统,探寻语文教育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 [1] 弗朗索瓦-玛丽·热拉尔,易克萨维耶·罗日叶.为了学习的教科书:编写、评估和使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 马磊,徐林祥.叶圣陶语文教材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2018(7):54-60.
- [3]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4]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三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
- [5]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1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 [6] 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2002-06-07)[2021-06-26].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386.htm.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9] 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七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0] 王宁.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课程的特质[J].中学语文教学,2016(11):4-8.
- [11] 成巧云,施涌.初中语文教材所存问题分析[J].语文建设,2007(9):12-13.
- [12] 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11):3-11.
- [13] 钟启泉.课堂转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4] 靳彤.“语文方法性知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8.
- [15] 教育部.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On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from the Evolution of Reading Aid System

ZHOU Jianqing, YANG Y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reading aid system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different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reading-aid syste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1949—1963) was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reading aid system, which emphasiz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The second stage (1963—1978) was the improvement period of reading aid system, which constructed grammar teaching system. The third stage (1978—2000) was the forming period of the reading aid system, which paid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ability. The fourth stage (2000—2011) was the reform period of the reading aid system, which focu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iteracy. The fifth stage (2011 to present) is the integration period, highlighting the Chinese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Keywords: Chinese cour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reading aid system; law of educa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